

郁达夫小说中的日本女人

陈晓兰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36)

摘要: 郁达夫主要从政治军事、地域、文化和日常生活三个层面认识日本,他的日本观也表现出三重性,三者既分离又结合。在文学创作中,郁达夫个人与日本的关系主要通过跨种族的两性关系得以体现,性别意识与国族意识、男性身份与民族身份相互对立。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体现了郁达夫对日本的道德评价。

关键词: 郁达夫;日本;女性形象

Abstract: Yu Dafu's knowledge of Japan contains Japanese politics and military affairs, its region, and its culture and daily life. In his works, his relation with Japan is expressed by the relation of both sexes from these two nations. Here the consciousness of sex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nation, the identity of a female and the identity of a race are all opposed against each other.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his novels represent Yu Dafu's moral judgment of Japan.

Key words: Yu Dafu; Japan; female characters

—

随着 19 世纪东西洋人闯入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外国因素或隐或现地存在于中国的事务甚至普通人的生活中,对外国的体验构成了中国人经验与情感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充满创伤的体验,对于 19 世纪以来的中国人而言,西洋、东洋一类的词总是会激起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它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但却是中国试图效仿的榜样,它吸引但同时又排斥着中国,在这里个人的幻想和欲望受到无情的挫折。与其说,

这种对异国的复杂体验属于那些被我们体验、想象、注视和言说的国家,不如说它更属于我们自己。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或日本不仅是官方、政治家思考的对象,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想象和谈论的对象。人们从不同的途径接触了或体验了他的谈论对象,或者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家的文本、文学艺术家的描述,或者通过短期的旅游、考察或长期的实地生活,或者从在中国的外国人、与外国相关的中国人身上认识异国,并形成了种种刻板形象。这些形象虽然与所谈论所叙述的实体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它却是经过了特定时期有着特殊追求的中国人这个中介的再创造,它体现更多的是中国人自身对传统、对他异者的态度和集体及个人内心欲求的诸方面。况且,异国,不仅是一个文化、地域意义上的他者,更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同盟者和对手,每一个人在面对一个异国时,个人的体验必然与民族国家的意识纠缠在一起,这使异国呈现出复杂、多重和分裂的特点。

在近100多年的中国文化史上,日本一直是思想家和文学家谈论的对象。日本的形象随着国际政治形势及中日关系的变化和中国国内对自身传统的认识与对未来的构想而不断变化。梁启超、鲁迅、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郁达夫等都曾对日本有过切身的体验,而且他们主要是通过日本来了解和认识西方及现代化的,他们以日本为主题或为背景的作品和言论表现了他们对于日本的理解和态度。或许可以说,在这些作家中,郁达夫与日本的关系比任何人都更复杂更矛盾。政治军事意义上的日本与文化、地域意义上的日本及国民日常生活中的日本之间既分离又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三者纠结在一起,影响了郁达夫对日本的体验和认识,而在异国他乡被强化的民族身份、国族意识又与他的性别身份、男性意识、个人欲望相对立、相冲突,使郁达夫在心理成长的过程中,遭遇到异常强烈的挫折感。

郁达夫在1936年写的《自传》中回忆了20多年前他初次见到日本时的感受。当他离开祖国驶入日本海时,他感到的是一种被解放的自由。美丽的大海、明媚无以复加、四周如画的濑户内海,小岛纵横、山清

水碧的长崎激起了他对日本民族和文化的景仰：“日本艺术的清淡多趣，日本民族的刻苦耐劳，就是从这一路上的风景，以及四周海上的果园垦植地看来，也可大致明白。蓬莱仙岛，所指的不知是否就是在一块地方，可是你若从中国东游，一过濑户内海，看看两岸的山光水色，与夫岸上的鱼户农村，即使你不是秦朝的徐福，总也要生出神仙窟宅的幻想来。何况我在当时正值多情多感、中国岁是十八岁哩！”^①在郁达夫尚未深入日本文化的核心之前，他是从自然的、地域意义上的日本来感受并描述日本的，在他的眼中，这是一个远离尘世的享乐世界，人可以超越一切局限，摆脱种种束缚和羁绊，个人的欲望都可以实现。他用“蓬莱仙境”、“神仙窟宅”来形容，日本变成了一个超越现实、自由享乐的道家境界，并由此联想到徐福，这一方面说明他对中日之间的历史关系的了解，而且也表明他对日本的感受和期待与“徐福东渡”的历史传说之间的某种连续性和相关性。^②另一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普遍的崇洋之风也影响了郁达夫对日本的美好想象。在郁达夫的青少年时代，既定的世界秩序早已发生巨变，异国也已不再是“西番”、“蛮夷”。对异国的肯定与对本民族的自我批判和反省意识的觉醒相伴而生，因此，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也把异国的入侵和中国的失败看作是应该由自己负责的结果。当西方和日本在对华实行殖民主义政策和排华意识空前高涨时，日本同西方一样，却变成了一个可以避难、足当效仿并能满足有关个人和国家欲望的理想之邦。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马里乌斯·詹森所说：“在19世纪后半期，在有影响的中国领袖人物心目中，日本逐渐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在冯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早期对日本制度变革和对技术做出的努力所流露出的赞美之情……明治时期的日本在清末儒家维新派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③19世纪最后几年，日本成了有志之士趋之若鹜的国家，终于在1896年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高潮。一方面知识分子把留洋看作寻求救国之路的途径，另一方面，清廷也由于外交和军事的需要鼓励出国留学，留洋已成为一项国策，朝廷制定了相应的章

程、选派办法、经费来源及回国后的奖励录用等措施。留学生依所获取的文凭高低而分别奖给拔贡、举人、进士、翰林出身,分别录用。^④统治者以功名利禄鼓励留洋,普通人也就把留洋作为升官、发财的途径,崇洋之风在民间十分盛行。郁达夫在其《自传》(1936)中描写了他去日本之前家乡的崇洋之风,而他自己也由于上了洋学堂、成绩优异而洋洋自得。郁达夫的长兄郁曼陀是清末的官费留学生,1910年7月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法律科,回国后应清廷留学生考试及格,奖给举人衔。他的二哥也在这前后于一洋学堂毕业,在一个驻防部队任排长,“这一文一武的两位芝麻绿豆官的哥哥,在那小小的县里,自然也耸动了视听”。^⑤同时,国内局势黑暗混乱,学校教育令人失望,在这样的环境下,郁达夫同许多中国人一样,在对日本缺乏切身体验之前,充满着海市蜃楼般的幻想和向往。郁云在《郁达夫传》中说,郁达夫当初是“满怀喜悦”离开家乡去日本的。郁达夫在其《自传》中也表现了他当时去日本时的心情:“鹄立在船仓的后部,西望着祖国的天空,却一点儿离乡去国的悲感都没有……大约因为生活的沉闷,两年来的蛰伏,已经把我的恋乡之情完全割断了。”^⑥然而,他在日本遭受的失败和挫折很快使他来日本的美好幻想破灭,而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好感的丧失又是在个人欲望的受挫中,在日常生活的创伤性体验中完成的。

二

1913年郁达夫到了日本,那时他只有18岁,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完成了他的成人仪式,这是他生理和心理成长的关键阶段,直到1922年,郁达夫完成学业回国,1945年被日本人杀害。郁达夫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包括他个人性格的形成、男性身份的确立、他与社会与女性的关系和态度、他回国后的政治立场、他对日本的态度等。郁达夫在日本的时间可以说是

漫长的,从1913年到1922年,近乎十年,他所接触的日本应该是全面而又广泛的,然而,从郁达夫留给世人的记录和叙述来看,他不断重复的一个主题便是一个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女人间的关系,这个留学生或者是作者自己,或者是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但这种关系似乎给作者自己的心灵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不仅成为他开始文学创作时的中心主题,而且致使他在后来有关日本的小说和自传中总是把日本与女性、两性关系与种族关系、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男性个体的身份危机与民族的身份危机纠缠在一起。而他的创作也由于对情欲的大胆表现而受到批评,同时又由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而被肯定。

郁达夫一踏上日本的土地,首先引起他注意的似乎便是引起他想象、并使他陷入混乱状态的作为商品的女人。正如李欧梵先生所说:“就是在日本,这些中国青年的大多数才开始不受限制地接受了外国的思想、外国的习惯以及日本的女人。专为中国学生提供膳宿的招待所通常都是由一些贫苦的日本家庭开办的,而年老的女房东往往都有个女儿。还常有艺妓馆、餐馆、茶馆,令人应接不暇,不断勾起这群总有点虚掷年华的少年们的声色口腹之欲。”^⑦郁达夫在《自传》中也叙述了当时所受的影响:“画报上的淑女名媛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妓妾的艳闻”,“街头名优半裸体的艳照”,“易卜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的两性观”,“对我这样一个灵魂纯洁、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引起的“只是一种感官的刺激和无法实现的性幻想”,而幻想和欲望的受挫又使他倍感“受到推挤”,沦入“消沉”。^⑧在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却只能通过日本的一些下等妓女,或以色情为生的女子,或者是旅馆酒店女招待、小商店的“看板娘”认识女人,并通过与她们的关系认识日本,并体验他与日本的关系。郁达夫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一样,被赋予一种家、国使命感:给家庭带来荣誉、财富,使国家富强。正是在这种家庭的责任感和对国家的使命感中,在男女的性别差异和高下尊卑的社会地位的区别中,中国男人的男性身份得以确定——这是一种

从性别意义上而言具有优越性的男性身份。在郁达夫的时代,虽然已经在提倡男女平等,但男性在社会地位及两性关系中的优越性和主导地位仍然是主导性的意识。从郁达夫的《自传》看,郁达夫也并不是一个天生自卑的人,他初到日本时,生活非常有规律,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然而,他与日本女人的接触使他失去了心态的平衡和一个男人不可或缺的自信和自尊,性别上低下的日本女人却由于种族上的优势对郁达夫表现出歧视的态度,她们作为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自尊的男人由于种族上的劣势而产生的屈辱和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一方面来自对当时衰弱的民族自我形象的认同,另一方面由于颠倒的两性关系而得到强化,性别上的优势与种族上的劣势使他处于矛盾状态。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国家主义意识和种族歧视无情地使他回到现实,并迫使他接受日本人强加给他的“中国人低劣”的意识。由于中国男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国家使命感使他们自觉地将民族命运与个人密切联系起来,将民族身份与个人身份等同起来,也由于郁达夫本人在日本的特殊经验,即在两性关系上的欲望与受挫的经验,使他将民族的衰弱和屈辱感内化为自我意识的组成部分,这使他产生了一种无能、无力、自卑和边缘感,使他在面对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异性时处于无力的绝望状态,这种无力衰弱感不仅表现在两性关系中,也体现在改变国家的愿望中。正如他所说:“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精湛……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爱神毒箭的那一刹那”。“从快乐的绝顶立时掉入到绝望的深渊底里去”,产生“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⑨在郁达夫心智成长的关键时期,其性意识的觉醒和伴随着两性关系和婚姻家庭而获得成人意识的过程,要在视自己为卑下软弱的异国的土地上完成,正如李欧梵所说:“发生在与外国女人之间”,郁达夫“无法抵制一个鄙视自己的国家里的女性——尤其是屈服于妓院里那些人的诱惑”,^⑩而这些在道

德上、性别上低下的诱惑者却表现出对他的歧视。郁达夫在日本的这种经历使他不再与中国认同——那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他的痛苦正是国家造成的,同时日本对他的歧视和排斥也使他无法认同日本文化,因此他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美国学者在跨文化认同现象的研究中,通过对以下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来确定一个移居于他文化的外国人的心理:一、是否渴望维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二、是否在这个社会中愿意与其他群体保持关系。对这两个问题的肯定回答表明了一种文化影响中的整合模式,对第一个问题的否定和对第二个问题的肯定表明了一种归化倾向,而对两者的否定则是边缘化的表现。而对中国人的调查则表明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对民族歧视的敏感远远超过其他民族的人。^④日本经历对郁达夫的心理影响是他浓烈的边缘人意识形成的重要原因,这种心灵创伤在他日后的生活中变成了一种恶梦。在两性关系中,他总是处于被对方控制的被动地位,在《迷羊》中,他表现了一个被情感控制的男人,时刻恐惧着被抛弃的命运,对于被抛弃、被排斥的恐惧使他在情感中必然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在表现两性关系时,他总是通过女性这面镜子对照男人。早期小说中的日本女人、《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中的女性人物,都具有镜子的功能:她们照出男主人公道德、性情和人格上的弱点。因此,从心理和人格的形成方面而言,日本的经历对郁达夫的影响是消极的、有害的。

三

郁达夫正是通过他所接触和遇到的日本女人及他与这些女人的关系来认识和体验日本的,在郁达夫有关日本经历和体验的描述中,日本女人占据突出地位,他通过女性表现日本,并通过性别关系表现他与日本的关系。在对长崎的自然美景的描绘中,他用“少女”这一比喻来形容长崎给他的印象和对他的吸引:“嗣后每次回国经过长崎,心里总要

跳跃半天,仿佛遇到了初恋的情人,或重翻到了几十年前写的情书。长崎现在虽已衰落了,但在我的回忆里,她却总有着那种活泼天真,像处女似的清丽的印象。”^⑩将日本女性化,并以对少女和情人的怀恋和欲求来比喻自己对日本的感觉,并将自己青春期与女性化的日本联系起来,其中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两性化的寓意是不言自明的。同样,在《归航》(1922)中,郁达夫也用了两性关系来比喻他与日本的关系:“我将要离日本了,我在沦亡的故国山河中,万一同老人追怀及少年时代的情人一般,有追思到日本的风物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可拿出几本描写日本的风俗人情的书来赏玩。”郁达夫对日本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他肯定日本的大自然和文化,他说“紫式部的同画卷似的文章,蓝苍的海浪,洁白的沙滩,层次雅淡的别庄,别庄内的美人,美人的幽梦”令他留恋,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屈辱又使他厌恶日本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日本的海岸是风光明媚的,日本的儿女是荒淫无忌、轻薄淫荡的。”“日本是我最厌恶土地,所以今后大约我总不至于再来的。因为我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所以将来大约我总不至坐在赴美国的船上,再向神户横滨来泊船的。”

在郁达夫有关日本的小说中,其中心主题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对日本女人的幻想、欲望及欲望的挫折。小说的结构总是千篇一律。孤独的中国学生被性感的日本女人所诱惑而陷入难以自拔的单相思,最后少女嫁给了日本男人。小说中的少女或者女人总有一个年长的家长,如静儿的五十多岁的母亲,从前在西洋菜馆里当过炉,看见男主人公带来的礼物就满脸堆笑。《沉沦》中少女的父亲,《南迁》中东京某旅馆 M 的父亲,这些家长像守护者,阻碍着小说主人公与日本女子的婚姻。这些家长大都是作为反面形象来表现的,如《南迁》中的父亲“身体伟巨”、“相貌狞恶”,将女儿作为商品,“卖”给第三者,而这个第三者往往是强壮的日本人或商人。《银灰色的死》中的静儿后来嫁给了一家酒馆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日本女人对于中国男人而言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欲望,一个被禁止得到的对象。

正如列维·施特劳斯所说,许多社会与文化的构成以交换女人为基础,一方面经由婚姻与家庭制度,在阶级与家庭之间流通女人,让男人挑选可以欲求的女人,从而维系父系血统的纯正,巩固父权价值。在男性社交上,“藉由女人的可欲求性,增加男人本身的价值,商品女人是男性价值的镜子。”“在象征层次上,男人欲求女人乃是男性社会结构的产物,男人透过取得令人欲求的女人而彼此交劲或结盟,建立权力关系”,正是女人建立了男性之间的彼此关系。^⑬从郁达夫对日本女人的想象和叙述来看,他在两性关系及种族关系上的观念具有传统性。在现实中,不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将女人作为商品和性及生育的工具,是他所熟习的。日本女人的实际状况证实了他的观点。他说:“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顺存男子”,但却没有中国那么固执的守身观念,不愿缠足深居。虽然郁达夫因为赤裸裸地暴露个人的感情而被看作是对传统、礼教的叛逆,但他的妇女观、两性观却是传统的。如果把他笔下的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作一比较,就发现这两种女人具有本质的区别。他在中日妇女形象上表现了传统文人的妇女观,即一方面把女人看作道德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把她们看作淫妇。中国女人和日本女人正是这两极分化的女性的代表。在有关日本的小说和散文中他主要描写了两类日本女人,一类是色情淫荡,在道德上、社会地位上都是卑劣和低下的妓女,以及下宿屋的招待女子和当炉的少妇,而后两类也常以色情赚钱或吸引客人。正如他在《银灰色的死》中所说:“东京的酒馆,当炉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他“知道她们想骗他的钱,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另一类是主人公作为追求对象的纯洁少女,如《银灰色的死》中的静儿、《南迁》和《风铃》中患病的女学生。但不论是哪种类型,在他笔下,她们都是被作为诱惑者和背叛者表现的。他在表现这些女性时所采用的手法和叙述语言,表现了他对这类女人的价值判断。在《沉沦》、《银灰色的死》中,他详细描写她们的服饰、色香味、小曲儿、红白的脸、蔷薇花似的嘴唇、笑靥、洋磁似的牙齿、雪嫩的纤手等等。他在《自传》中,详细地描写了日本女人的身体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日

本女人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弱柳,瘦似黄花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份富含异质,因而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透,细白得像似磁体,至于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在日本也有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④这段描述的语言和方式将日本女人作为异类女人(以中国女人为参照)和诱惑者的特点暴露无疑,他这种谈论女人的方法和对她们的肆无忌惮的注视本身就含有一种贬低意味。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只有对那些被作为性对象的女子的描述中才运用这种手法,即通过女人的服饰和媚态来暗示身体和性意味,如梁朝的宫体诗、以风尘女子为对象的传奇、小说、戏曲。虽然郁达夫颇有兴致地描写日本女人的身体,但他仍然认为身体和欲望是可耻的,这也是中国传统对待身体和欲望的态度。他在表现中国女性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词汇和方法,表现了他的不同态度和价值判断,因此,他笔下的中国女人也不同于日本女人,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和本质。他以中国女人为主题的小说大多写于1922年回国后。小说《空虚》虽然以日本为背景,穿插了他对一个中国女子的单相思,但却没有对她进行色情化的描述,而是用“纯洁的处女的娇美”来形容她的美丽,她的黑色的制服,使她联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圣画“天鹅图”。《孤独》虽然是以“名妓李芳人”为主人公,但只写了她的悲惨的身世。《春潮》以一对中国青年男女诗礼和秋英的纯洁爱情为主题。《莛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等都塑造了纯洁的中国女性,写了她们对男主人公灵魂的净化。而在《出奔》(1935)和《她是一个弱女子》(1932)中,他又用了表现日本女人的相似手法,即通过对欲望的表现,来塑造他所肯定或否定的人物。《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李文卿女父和《出奔》中的董婉珍都是有产阶级的代表,前者是性变态者、色情狂和乱伦者,后者却以色相诱惑革命队伍中的青年,这两篇小说非常明确地表现了作者对欲望的否定态度。郁达夫的小说主要是用极度夸张的手法表现他的感情,两性关系是其小说的重要主题,但由于他在表现中日妇女时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法,所以他的小说以1922年为界显示出不同的风

格,中间不存在过渡形态。他描写中国妓女的小说《秋柳》写于1922年他再度回日本时,这也许并非是一个巧合,日本似乎总是一个激发其性幻想的地方。不过,他对这些中国妓女的表现方式也不同于对日本女人和妓女的表现方式,他对于她们的感情和评价是单一的,她们也不像日本妓女那么丑陋和淫荡。由于郁达夫在早期小说中赤裸裸地表现女性的性诱惑及主人公的个人情感和变态心理而被视为色情、颓废,这些小说一般都从郁达夫在日本时的生活经历来解释。仅就他个人的生活经历而言,把日本色情化,与郁达夫在日本时所接触的日本生活和日本女人有直接关系。他的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说、散文和《自传》都提供了他在日本的生活情形。然而郁达夫并没有表现出对这样一种日本的认同。虽然日本是一个令人迷惑的对象,它更多的表现出原始和本能的一面,但在理智上,日本和日本女人并不是他所喜爱和值得尊敬的。在《菀萝行》中,他一方面表现了一个温柔、贞洁、克制的传统妻子形象,表现了他的怜悯,另一方面,他又向她忏悔自己在日本时的放荡生活,他说那些日本女人,“灵感丧失了的妩媚的游女,和她们的姣艳动人的假笑佯啼,终究把我的天良迷惑住了。”他痛恨在日本时对“灯红酒绿的沉缅,荒妄的邪游,不义的淫乐”。他的本我与超我在不断地冲突,这使他总是处于一种罪责感中。个人的欲望和伦理道德的冲突,通过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得到了形象化的表现,郁达夫对中国女人的态度,特别是《菀萝行》中对于妻子形象的表现,说明了作为反传统的五四浪漫主义作家的郁达夫对于传统道德的复杂态度。而他对日本女人的表现和道德价值判断又与他的日本观相联系。

同样,郭沫若的小说《喀尔美罗姑娘》也表现了中国女人和日本女人作为道德化身和欲望化身的对立。主人公“我”的妻子“瑞华”既有现代女性的知识和独立意识,又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宽容、忍耐,如同母亲,“我”也把她当作母亲、姐姐来爱。“我对于她只有礼赞的念头,就如象我礼赞圣母玛丽亚一样”,她是生活在圣洁的光辉中的人,在她的光辉中,“我”觉得痛苦、卑下。“我抱着圣母的塑像驰骋着爱欲的梦

想,我的自我的分裂,我的三重生活”。如果说她是“中世纪的圣画”,那么,日本女子则是古代希腊雕像加了近代色彩。作者同样运用了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刻画了一个诱惑者的形象,而这个女人也是一个替人作招牌、在糖食店做“看板娘”的商妇,后来她做了咖啡店的侍女,“一种新式的卖笑生活”。小说表现我面对这两类女人时的矛盾心理,而这种矛盾恰是传统道德与个人欲望之间冲突的表现。如同许多被看做反传统的现代作家,郭沫若和郁达夫却通过女性形象,表现了他们对于传统道德的矛盾态度。

如果说郁达夫曾被冠之以色情、颓废和堕落,那么这种颓废、色情和堕落只与日本有关。而将色情、颓废和堕落与异端、他异者进而与异国联系起来,并非限于郁达夫,在晚清及30年代表现都市特别是上海生活的小说中都非常突出。这反映了特定时期中国人对他异者和异国的理解和想象。在19世纪末、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异国总是被作为欲望放纵、色情的象征来表现的,中国人对这样一个异国也总是表现出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矛盾情感。而在对异国的想象和价值判断中,仍然没有超出道德评判——主要是性道德和传统的义利观的范围,因此,异国,作为中国的他异者,虽然代表着时代进步的潮流,但在道德上是堕落的,它所体现的正是儒家道德的反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对个人欲望严加防范、革新时期又提倡反传统和个性解放的特定时期,人的解放就变成了情感和欲望的解放,有关性和性别的话语成为许多革新者文本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把异国看作一个在幻想中可以实现所有欲望的所在,则隐藏着对欲望的复杂态度,而对这样一个欲望化或者色情化的异国的态度又表现出与传统道德的暗合。

因此,郁达夫与日本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单向的影响关系。在二者的接触中,两个民族固有的传统及现代意识在冲突、在印证。郁达夫对日本的理解不仅来自日本的现实,而且也来自一种先在的思维惯势。叙述结构中的日本形象,与其说是日本的真实,不如说更多地蕴涵着郁达夫自身的感情和困惑。然而,这又不是他个人所能控制的。他的个

人情感与国家民族情感纠缠、两性关系与种族关系、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非理性的欲望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都围绕着中国与日本这两极的相遇与碰撞,相互交织在一起。他对日本女人的态度,渗透着他对日本的态度,他与日本女人的关系也就成了他与日本民族关系的象征,表现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复杂化和紧张性。

注:

- ① 郁达夫:《自传》,《郁达夫散文》(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47页。
- ② 陈佳荣:《中外交通史》,学津出版社1987年,第19页;“徐福东渡的史事已无从考查,《史记》记载“(二十八年)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齐戒与童男女求之。”徐福一去不返,更令人遐想,人们或传说他将童男女入海求神仙、长生不老药止此州不还,或传说他做了大官。”
- ③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35页。
- ④ 陈学洵、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6页。
- ⑤ 郁达夫:《自传》,《郁达夫散文》(下):“当书院的旧考棚改为中国式的洋房时,甚至离城六十里远的乡下人,都成群结队地来看新鲜。在校堂改造成功的半年之中,洋学堂三个字,成了茶店酒馆、乡村城市的谈论中心”,“高等小学校的堂长,更是了不得的一位大人物,进进出出,用的是蓝呢小轿,知县请客,总少不了他。”连学堂里的肉馒头,对于乡下人而言,也是因为学堂里的东西,“吃了是可以驱邪启智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8页。
- ⑥ 郁达夫《自传》,同①,第46页。
- ⑦ 李欧梵:《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主义一代》,见陈子善、王自立编《郁达夫研究资料》,(香港)三联书店三联分店、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1986年,第534—535页。
- ⑧⑨ 《雪夜——自传之一章》,《郁达夫文集·第四卷·散文》,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94页,第93页。
- ⑩ 同⑦,第534—535页。
- ⑪ Kenneth L. Dion and Karen K. Dion, Chinese Adaption to Foreign Cultures, Michael Harris Bond edited, *Chinese Psych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59.
- ⑫ 同①,第51页。
- ⑬ 刘雅亮:《女人·性别与(抵)殖民主义——佛斯特的〈印度之旅〉中的性别与种族政治》,台湾《中外文学》第27卷,第3期,1998年8月,第64页。
- ⑭ 同①,第51页。